

新加坡的小贩文化

刘梅萍

(郑州大学, 河南省郑州市, 450001)

摘要: 2020 年, 新加坡的小贩文化正式列入教科文组织的非遗代表作名录, 这个现象引发国际社会的讨论。本文从小贩文化的产生根基和具体表现形式来论证小贩文化是如何落地并生根的, 论证新加坡为何选择小贩文化来申遗, 最后再提出新加坡保护小贩文化这一非遗的具体措施, 给予世界各国在保护非遗方面一定的启示。

关键词: 新加坡小贩文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 饮食文化, 文化政策

中图分类号: G1

文献标识码: A

新加坡曾被英国殖民统治, 统治时间长达 140 年, 直到 1965 年新加坡才得以真正独立。新加坡国土面积小, 自然资源也较少, 因此有人说, 独立后的新加坡是没有前途的, 独立后的新加坡要发展确实会遇到重重困难, 但经过四十多年的时间, 新加坡靠着自己的努力和探索, 克服了许多困难, 在工业化、现代化、文化建设、公民道德素养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成绩斐然。

2020 年 12 月, “新加坡小贩文化” 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简称 “教科文组织”)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简称 “代表作名录”)。这个现象不仅引起周边同样拥有小贩文化的国家的关注, 更是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讨论, 国际社会发出疑问: 小贩文化为什么能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小贩文化能否被视为非遗项目? 新加坡为何会选择小贩文化进行首次申遗? 要回答这些问题, 需要先了解非遗的具体属性特征和确立的重要意义, 首先, 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可见, 非遗的基本属性是动态性、包容性、有代表性和以社区为基础的集体认同性, 其次, 之所以将非遗项目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是因为这样可以扩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见度, 从而让社会认识到非遗的重要意义, 实行一些保护措施。最后,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站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 和世界文化进行共享交流, 从而促进国家间的文化对话。从以上三点非遗文化方面来看, 小贩文化是符合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条件。

聚焦各种建设中的文化方面, 新加坡是如何完成文化共同体建设这个艰难历程的? 又是如何通过政策和一些建设项目去赋权社区, 从而营造出小贩文化得以存续的城市环境? 小贩文化又是如何申遗成功的? 这些就是本文要讨论的地方。

一、小贩文化的产生根基: 文化政策的演进

新加坡文化政策的发展大致经过了民族文化政策、文化经济政策和文化社会政策三个阶段。在新加坡独立的前期, 即 1965-1985 年, 新加坡的文化政策主要是民族文化政策, 建国初期, 新加坡一方面需要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经济结构和促进社会就业, 另一方面还需

要尽快建设主权国家的文化价值体系,帮助国人树立民族观念,提供精神动力。在这一阶段,新加坡主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平衡好西方的功利主义和东方的儒家文化,确立好新加坡人的共同价值观。在建国初期,新加坡主要是采用实用主义的观点,通过危机意识去唤醒国人的爱国情感,同时满足他们的物质需求。但 20 世纪 70 年代新加坡产生了经济功利主义方面的价值危机,为避免过度西化,新加坡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发起一场“文化再生”运动,试图以儒家思想为外表来制定日常文化经济建构,但这种做法引起了一部分非华人的反感。直至 1988 年,新加坡第一副总理吴作栋提出自己的建议,他认为可以将价值观上升到国家认同,随后发布的《共同价值观白皮书》则是站在国家的基础上,提出了全新的价值观,这个本土价值观的设计得到较好的反响。二是统一官方语言,重建文化共同体的语言基础。早在 1956 年,新加坡在国家语言教育计划中就强调了语言平等原则,在 1965 年,国会制定了《新加坡共和国独立法》,其中规定了马来文、华文、淡米尔语、英语为官方语言,马来语是国语。1965-1970 年,新加坡开始对四大官方语言进行校正,但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非本土化语言,例如“新加坡华语”和“新加坡英语”得以存在。新加坡语言作为国家统一的语言基础,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也是人民群众的价值选择。在此期间,新加坡的文化再生运动,即配合着新的社会经济发展出现的文化重建取得了一定阶段的成果。

进入 90 年代,即 1989-2012 年,社会经济高度发展,新加坡正在逐步脱离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困境,此时新加坡的文化再生运动达到了高潮,国家的文化政策从聚焦在政治层面转变为聚焦在经济层面,重心变为文化创意产业。此阶段的主要措施有两个,第一是完善并升级基础设施建设,挖掘文化方面的经济价值。新加坡的信息与艺术部和旅游发展局在 1995 年明确提出要将新加坡变为“全球艺术之都”的目标,这个目标将在 2000 年完成,并将这个目标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在落实文化产业化的时候,新加坡政府不忘保持其人文价值,只改良了制度和管理结构。此外,政府还投入升级了文化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希望新加坡可以以“城市巨型项目”和“壮观空间”确立自己的“全球艺术之都”的地位,这一时期政府在文化方面的投资得到了政策的支持,那些休闲娱乐、博物馆、美术馆都不再是无序的发展状态。第二个措施是多部门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提升文化产业的创造力。2000 年新加坡发布了“文艺复兴城市规划”,这时候的文化政策的重点主要是文化设施的创意展现。此阶段体现了新加坡“文化共同体”这一设想的苗头,直至 2015 年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了新加坡“创意城市设计之都”这个称号,这也说明了新加坡的设计得到了世界的认可。

到 2012 年,新加坡的文化政策进入了第三阶段,即 2012-2024 年,新加坡出现了社会化转向,在文化方面强化新加坡人的民族认同感。这一阶段也主要是两个措施,第一是增加公民的参与度,文化和艺术方面是服务于所有新加坡人的,所有人都是可以参与。第二是重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提高群众的社会历史意识。2018 年,新加坡文物局发布了“新加坡文化遗产计划”,政府从四个方面对新加坡文化遗产计划进行了详细的说明,这个规划主要是

希望能通过文化遗产的保护，从而增强新加坡国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新加坡在建国之后就遇见了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这双重困难，为了解决这些难题，新加坡从文化政策入手，也就是上文提及的文化政策演变的三个阶段。综上不难发现，文化政策的演变过程主要呈现出几个特点，一是文化政策目标从塑造经济文化共同体转变为塑造文化共同体，二是政策重心主要从全球化转变为本土化，三是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由偏重民族认同转化为偏重国家认同。在这样的文化大背景下，再来看小贩文化的发展过程，可以发现其交融之处。在新加坡独立前期，即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刚独立的新加坡面临着严重的就业问题，很多失业者为了谋生就开始在街边摆摊，成为了街边小贩。这个现象很容易就引发了交通和卫生方面的问题，政府为了腾出空间发展商业，对此现象采取了严格管制的措施，主要呈现为让小贩去打预防针、安排一些小贩到工厂去上班等。直至 1972 年，新加坡在裕廊建立了第一个小贩中心，街边小贩纷纷搬进政府管理的小贩中心，有房子遮风挡雨，水电设备和桌椅齐全，至此，街边的小贩变成了居有定所的小贩，他们得到了政府的认可。随着文化政策的演进，新加坡很重视自身的文化建设，政策重心也体现了从全球化转变为本土化，小贩文化应运而生并顺势发展，从新加坡建国以来见证着新加坡的文化政策发展，承载着新加坡本土的文化记忆，所以能够得到政府的重视，在文化重建运动中保存下来。到 2020 年，小贩文化申遗成功，这是新加坡文化政策演进的集中体现，也是国人国家认同感增强的具体表现。

二、小贩文化的表现形式：国家认同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来看，非遗的基本属性主要表现为动态性、包容性、代表性、以社区为基础的集体认同性。小贩文化作为新加坡的本土文化，具有相应的代表性和集体认同性，同时小贩文化在产生之后，并不是固步自封的，而是在和世界各地的文化进行对话，注重各国文化的多样性，这个过程是动态发展的。在申遗的材料上，小贩文化是这样被表述的：“新加坡小贩文化：‘新加坡小贩文化：多元文化城市背景下的社区餐饮与烹饪习俗’遍布于新加坡。小贩们给来小贩中心聚餐的食客们制备各式小贩食物（hawker food）。这些小贩中心充当着‘社区餐厅’，让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们在这里聚集在一起，在一日三餐中共享用餐的体验。国际象棋、街头表演和艺术表演等活动也在此开展。”在这段描述中可以发现，新加坡小贩文化主要是动态遗产的一种表现形式，为拥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提供了一个共同交流的机会，这个文化场所包容性很强，容纳了多元的文化，促进了国人的交流，这种体验和客群是流动的，同时小贩文化还承载着其他动态的活动，例如街头艺术表演和文艺汇演等。这个申遗材料避开了充满争议的内容，并没有对美食内容进行描述，也没有强调厨艺和菜品有多么精湛，而是强调了这个文化是用来增强民族凝聚力、增强社会责任感和认同感的。对比国内饮食类非遗保护的重技艺而忽视文化，新加坡的重文化的申报方式更符合非遗的申请标准，这也给中国的饮食类项目的申遗带来启发。那些有空调的饭店、餐饮店、奶茶

店，无疑是新加坡人解决三餐的好场所，但只有在这个充满着本土记忆的地方，才能更好的唤起新加坡人心中的自豪感与认同感。新加坡是一个移民大国，文化包罗万象，在这样的小贩街头中，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能够在此吃好饭，也能在此完成自己的文化交流，满足自身的情感需求。

从历史发展来看，小贩文化从历史顽疾逐渐发展为国家认同。从 19 世纪初到 20 世纪初，新加坡正处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下，这一时期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得到了来自中国、印度的大量移民。新的劳工加入，促进了新加坡的城市化进程，新加坡从大量的商品贸易转移为逐渐拥有大量的种植园和农场。在大量移民涌入的情况下，大部分的男性劳动者需要便捷的饮食，流动小贩在这时便应运而生，这时候小贩们制作的饮食大多是比较便捷的食物，例如米饭和面食，肉类和蔬菜相对较少。这时候的食物类型是早期的小贩食物类型，和现在的小贩文化中心售卖的食物不太一样。根据新加坡博物馆的相关记录，早期的小贩在卖鸡米饭的时候，会用蕉叶去包裹食物，食物类型比较简单，而现在的食物类型更多，色香味也比较丰富。小贩经济的流动性较强，既方便了人们的生活，同时，由于早期缺少政府的管理，流动小贩呈现出无序的状态，并引发了一系列卫生问题和交通问题。例如，《海峡时报》上出现的特伦加奴街拥挤不堪，这就体现了流动小贩出现的交通问题。在街边，小贩们做出的食物的安全问题较难得到保障，在卖完食物之后，小贩还会在地面上留下一堆垃圾，新加坡处于热带地区，在这样的气候下，这些垃圾会散发出腐烂的臭味，影响公共卫生，污染范围也因此扩大。街头小贩流动性很强，摆放的位置和时间都是不定的，因此，清洁工也很难针对性地对街道垃圾进行清除。这时候，市民作为城市环境的主要参与者，就开始写信给报纸，对小贩产生的交通卫生问题进行吐槽。根据这种情况，政府开始采取相应的措施，在 1924 年的市政委员会上，就有人提出用有执照的饭店来取代流动的小贩。但在这个措施提出之后，市民们不抱怨小贩们了，反而是为小贩们说话，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在就业困难的情况下，流动小贩的这个身份让一些失业者得以生存，得以养家糊口，同时流动小贩提供的食物是比较便宜的，一旦换成有营业执照的饭店，很多劳工人民就消费不起，这是很现实的经济问题，食物成本增加，人们的生活成本也会提高，这样就可能会出现物价上涨的问题。因此，民众反对的呼声越来越大，这引起了华人商会的关注，他们向政府提出了自己的诉求：需要政府介入，对小贩经济进行管理和监管。在新加坡独立之前的历史中，小贩是以流动小贩的形式出现，这时候更多的是社会顽疾。

自 1965 年新加坡独立之后，新政府采取新措施来应对之前出现的小贩问题。1968 年，政府在人口普查中，给了 18000 个小贩营业执照，其他的就取消他们的小贩身份。在国家的建房规划中，政府将小贩中心纳入计划范围，让小贩中心更加靠近住房区和中心地带。新加坡的第一个小贩中心建在 1974 年，流动小贩至此成为了历史。以前流动小贩带来的更多是社会顽疾，展现出来的社会环境是臭脏乱，在新加坡独立之后，随着新加坡文化政策的发展，

国家的政策重心更加侧重本土化，小贩文化在历史发展中，从以前的臭脏乱的流动小贩，逐渐转变口碑，往好的方向发展。在新加坡政府的参与下，流动小贩得以管控和监督，逐渐演变为有序的小贩中心，据统计，截至 2021 年，新加坡已经建成 110 多个小贩中心。在小贩中心下，小贩们不仅可以不再风吹日晒，顾客们也可以在整洁的环境下用餐，享受琳琅满目的食物。以前流动小贩中的美食——蕉叶鸡肉饭已经难以找到，现在呈现在顾客眼前的是干净餐桌上的海南鸡饭。小贩中心的食物不仅味美，还价廉，顾客一般消费了 3-5 元（折合人民币 15-25 元）就能够吃饱，结合顾客们的工资水平和小贩中心的消费水平，一个新加坡人如果三餐都在小贩中心消费，餐费大约占工资的 26%，由此可见，小贩中心不仅消费空间舒适，还可以让人们消费有度。

那么小贩中心是如何发展为国家认同的呢？这不得不提起历史原因，在新加坡独立之前，英国殖民统治下的新加坡主要是采取种族隔离的政策，把人口按照中国人、马来人、印度人，还有除了这三个国的其他族人分隔开，在新加坡独立之后，政府开始介入，希望能改变这种分裂的状态。政府加大对小贩中心的投入，不仅是考虑到了管理城市，更多的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促进多元文化之间的交流。新成立的发展局将一些族群的人迁移到高层的住宅区，并按照相应的比例来协调好不同族群的人的住所，促进族群之间的交流，围绕住宅区而建的小贩中心，不仅为这些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提供交流的场所，也促进族际的融合发展，让多元文化得以融合。在一个共同场所一起用餐，共享小贩食物，容易拉近人们之间的距离，不同族群的人们在一起会对食物产生一种归属感，在族群的文化交流中得到一种文化认同感，有人用新加坡当地的语言“罗惹”（马来语表示“混合物”）来形容一道菜，这道沙拉包括油条、黄瓜、油炸豆腐等，代表着不同文化多元融合的现象。独立后的短短几年时间，小贩文化逐渐从流动小贩这一社会顽疾转化为国家认同，小贩中心的食物变成一些新加坡国人的归属感寄托，让新加坡国人在国外一吃到家乡的美食，就像回到自己的家乡。2007 年，新加坡的侨民在纽约举办了新加坡日活动，其中出现了小贩文化中的一些美食，例如，马里士他肉骨茶，这道小贩美食带领着海外的新加坡人去重温家乡文化，并向其他国的国人展示本国文化的特色。小贩文化，背后承载的是一种国家认同和多元文化融合，让人们受到“一起吃饭”的潜移默化影响，这不仅彰显了新加坡人对自己国家文化的认可，也表现了建设文化共同体的目标。

三、小贩文化非遗的保护

小贩文化能够申报并列入《公约》中，不仅让我们看到非遗的具体实践，也能让我们思考该如何界定饮食类的非遗项目。在反思本国的饮食类非遗项目的同时，可以借鉴新加坡的具体做法，非遗的主要作用是用来传达文化的包容性，非遗申请成功后，可以让世界看到并尊重文化多样性。小贩文化作为国别申报的文化项目，申报内容在多方面体现了《公约》的内容，还包括参与性和包容性，被推荐为申报的优秀范例，这个例子让大家看到了城市环

境下是如何进行非遗的保护的，也让大家看到了政府是如何通过文化政策和一些管理方法，去赋权非遗成长的社会环境，比如社区等。新加坡在申请非遗的时候，没有强调自身美味的食物和精湛的厨艺，而是强调了自身的申报重点在于“多元文化的城市环境下的社区餐饮和烹饪实践”，新加坡并不是独占这个文化，而是让更多人看见并保护这个文化，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去共享这个小贩文化，小贩食物在制作过程中需要考虑多个族群的人的饮食禁忌，主要是以混合性和创新性方式出现，这也体现了不同族群多元文化的融合。

新加坡在首次申请非遗的时候，关于小贩食物的呼声很高，又过了两年，在2020年，小贩食物作为申报的内容成功纳入非遗的代表作名录，这个过程体现了社区对非遗的认识发生了改变。列入到非遗的代表作名录中，小贩文化的可见度大大提高，拥有相类似饮食文化的国家之间会进行文化交流，不管是个体还是群体，是否拥有相同的文化背景，其他国家都能够在新加坡小贩文化的影响下，对本国的饮食方面的文化进行相应的保护。小贩文化的申遗成功，不仅增加了本国的工作机会和社会实践内容，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可能会带来过度商业化的问题。针对这个社会风险，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第一是国家会尽量肯定小贩文化以个人经营的方式，而不是企业经营，第二是面对小贩文化申遗成功后需求会增加的问题，全国联商总会、小贩协会与国家环境局会配合解决这个问题，例如增加拨款、资助小贩购买一些饮食器具、雇佣工人清洁餐具等，第三是政府会继续对小贩中心进行管理和监督，强调小贩中心的重点在于社区餐饮和公共空间，避免在申遗成功之后改变小贩中心的社会文化功能。除了这些措施，国家需要完善相关的政策，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能够在小贩中心里买到属于自己的美食，满足更多人的文化需求。

新加坡对非遗文化的保护，总的来说是采用一种“整体方法”政策，大家可以从这个案例中吸收相应的保护经验。“整体方面”主要指的是提高社会认识，提高对非遗重要性的认识，让大家都参与到文化保护中去，避免出现前面提到的过度商业化的现象，从而达到非遗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两者的平衡。要如何达到这个目标，第一是组织更多与饮食类遗产相关的会议，让一些店铺去了解公约，加强大家对小贩文化的认识，促进文化交流。例如“慢食新加坡”将本地的饮食文化进行推广和普及，并设置相关奖项去让大家关注并认可那些小摊餐饮老店。第二是利用电视台、报纸、短视频等媒体媒介来宣传小贩文化的社会文化意义，例如电视台可以在国际平台去播报关于小贩的一天，引导公众去尊重小贩群体；不定期举办一些街头美食大赛，让一些游客也能参与到小贩文化中去。第三是社会各界共同发力，像社区、政府、非政府组织和一些机构应该携手，提高群众对小贩文化的认识，举办一些类似新加坡传统节和美食节的活动。

从新加坡成功申请非遗的案例来看，新加坡的社区对非遗的认识发生了改变。从新加坡保护小贩文化非遗的相关措施来看，社会对非遗的保护应该是多方面的，要想提高大家对非遗的认识，不应该只着眼一个非遗项目，而是要向全社会宣传动态非遗的重要性，只有提高

大家的认识,才能推进多方参与对非遗的保护。提高民众认识的同时,也需要进行相关的实践建设,让参与者从保护非遗中有所收获。

四、结语

在现在的社会中,城市人口占比很高,城市中会出现一些关于可持续发展的问題。教科文组织也一直在探索,文化对城市创新性的激发有什么意义?直至2016年,教科文组织发布了《文化:城市未来——文化推动可持续城市发展全球报告》,这个报告列举大量的案例,让大家看到文化对城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合理运用文化的反作用,有助于推动建成一个包容性强的城市。非遗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能促进民众的归属感和认同感,那么保护非遗也就显得重要。

从新加坡的小贩文化这个案例来看,非遗保护和城市发展两者密不可分。正是政府在一开始的住宅区规划中,考虑到建设小贩中心,才有接下来的小贩文化的延续。正是有了延续,住宅区不同族群的人才能“在一起吃”,进行多元文化的交融之后,小贩文化才成为了国家认同的象征。新加坡的非遗保护实践给予世界的启示是,非遗的持续力来源于本土的力量,生根在寻常街巷中,要挖掘自身的文化自信,推动自身文化的创新性转型和发展,才能在本土和世界各地文化的交流中长久发展。

参考文献:

- [1] Government of Singapore, Nomination file No.01568 for Inscription of “Hawker culture in Singapore, community dining and culinary practices in a multicultural urban context” in 2020 (15. COM) on the Representative Lis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Humanity, n.d., <https://ich.unesco.org/en/RL/hawker-culture-in-singapore-community-dining-and-culinary-practices-in-a-multicultural-urban-context-01568>, accessed on 31-03-2021. 该遗产项目的申报材料卷宗可从以上网址获取,行文中不再另作说明。
- [2] Anon, “Hawker Inquiry Opens Today,” Straits Times, 1950-04-20, p.6., <http://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straitstimes19500420.2.107.aspx>, 发布日期不详,访问日期:2021年3月31日。
- [3] 曼纽尔·卡斯特著,曹荣湘译.认同的力量(第二版)[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 [4] 程瑶.城市环境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以“新加坡小贩文化”的申遗实践为主线[J].民族艺术,2022,(03):90-99. DOI:10.16564/j.cnki.1003-2568.2022.03.004.
- [5] 傅才武,邓时.多元族群社会的文化共同体构建:新加坡文化政策的演进逻辑[J].江汉论坛,2023,(04):61-68.
- [6] 焦玉莉.兼容并蓄和谐发展——新加坡文化建设的经验与启示[J].科学社会主义,2014,(06):96-98.
- [7] 韦依帆,刘畅.城镇化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困境[J].河南社会科学,2019,27(10):119-124.
- [8] 李晓渝.新加坡的“小贩文化”[J].共产党员,2019,(15):63.
- [9] 吕小玉,冯艳.新加坡的文化再生运动研究与启示[J].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14,(02):33-36.
- [10] 凌周飞.饮食之道与文化认同:新加坡非遗“小贩文化”的启示[J].非遗传承研究,2022,(03):46-49.

Hawker culture in Singapore

Liumeiping

(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City,Henan Province,450001)

Abstract: In 2020, Singapore's hawker culture was officially inscribed on UNESCO's Representative Lis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 phenomenon that sparked international discuss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hawker culture came into being and took root from the roots and specific manifestations of hawker culture, demonstrates why Singapore chose hawker culture to apply for UNESCO heritage status,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specific measures to protect hawker culture as an intangible heritage in Singapore, giving some inspiration to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in th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heritage.

Key words: Singapore hawker cultur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food culture, cultural policy

作者简介: 郑州大学文学院 2023 级研究生,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